
略论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任东来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战期间,中国曾得到国际上许多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美国对华援助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国民政府通过争取美国的援助,既加强了自己抗战的实力,也增加其与国内政治对手斗争的资本,同时还逐步把美国拉入到对日战争之中。美国政府则以援助为代价,让中国来拖住日本侵略扩张的步伐,减轻自身的战争压力,同时扩大其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底美国宣布对华“桐油贷款”到1941年5月美国宣布中国为《租借法》受援国,是中美同盟的酝酿期;第二阶段从1941年5月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是中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期;第三阶段从1945年2月到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是中美同盟的蜕变期。

尽管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的斗争中,中美两国最终在1941年结成了抗日同盟,但中美两国战略利益不尽相同,实力地位相距甚大,加之中国国内政局复杂,因此,在这一抗日同盟中,双方也存在着种种分歧与矛盾。本文将概要地分析以美援为核心的中美抗日同盟的形成、发展与蜕变,探讨中美同盟框架下中美双方的利益协调和冲突,进而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有一全貌的认识。

一 贷款援助与中美抗日同盟的酝酿(1938.9—1941.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一再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援助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但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冷淡。只是随着日本侵略扩张活动的日益加强,西方国家在华以及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断受到破坏和威胁,美国才逐步确立用援助中国来遏制日本扩张的政策,开始向中国提供数量有限的商业贷款。

1938年底,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购货贷款,中国以桐油出口来偿还,史称“桐油借款”。为避免给日本留下反美的口实,1939年2月中美两国分别通过中国政府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和美国政府所属的进出口银行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实际上,整个争取借款的谈判都是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具体负责此事的则是中国财政部代表、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桐油借款开美国援华之先河,并创立了以民间商业形式为掩护的援助先例。

1940年4月,经过陈光甫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几个月不懈努力,利用美国向苏芬战争中的芬兰提供援助之际,中国争取到第二笔购货贷款2000万美元,因以云南出产的锡矿出口作抵押,故称“滇锡借款”。上述两笔借款虽然加强了中国抗战的物质力量,提高了抗战士气,但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940年9月日本占领了法属越南,直接威胁欧美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美国遂决定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钨砂贷款”。此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并迫使美国逐步放弃在经济上绥靖日本的作法。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三国轴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从而“在一个远比中国的命运对美

国更密切的问题上使自己处于与美国对立的地位”。11月30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府。美国政府因此担心重庆政府会与汪伪政府作妥协,遂宣布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半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金属贷款”,另一半是财政部提供的平准基金(稳定通货)贷款。有关协议分别在次年2月4日签订。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援助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国提供贷款的时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话说,不到重庆政府“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因此其效果每每收到“打强心针之效能”。第二,美国援华的目的在于遏制日本,因此援华都限制在不致于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范围之内。除平准基金外,其余贷款都是限制用途(非军事项目)的商业购货贷款(参见表1)。

1938—1941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以后十年美国大规模卷入中国事务的开始,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未来中美抗日同盟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对此提出了他并没有很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国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要向美国的政策设计者寻求帮助呢?”这个问题看来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

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以来,中国历届统治者自身已经没有力量平息较为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只能靠借助外国势力来维持自己的衰败统治。他们或希望借洋人之力镇压人民反抗,击败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或幻想用以夷制夷之计来抵御外国侵略。

(美)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

有关“桐油借款”到1亿美元贷款期间美援的详情可参见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围绕着美国贷款展开的中美外交”,《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5—6合期和“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7页。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页。

从晚清的李鸿章、张之洞到北洋军阀,无一不是如此,即使是以民族主义标榜的国民政府也没有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地和对外关系模式。30年代,蒋介石曾想靠依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来实现军事现代化。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借助国际联盟以及苏、德、英、美、法等国的力量来结束战争。求援一时间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工作和显著特色。

表1 1939—1944年美国对华贷款(单位:百万美元)

协定日期	数额	最后到期日	利率%	保证	用途
1939年2月8日	25	1944年	4.5(后改为4)	桐油出口, 中国银行作保	非军事品购买
1940年4月20日	20	1951年	4	锡出口, 中国银行作保	非军事品购买
1940年10月22日	25	1945年	4	钨出口, 中国中央银行偿还	非军事品购买
1941年2月4日	50	1948年	4	锡和其它矿物输出, 中国中央银行偿还	非军事品购买
1941年4月31日	50	1943年还清	1.5	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偿还	稳定通货

材料来源: 杨格:《中国与外援》(A. Young, *China and Helping Hand*), 坎布里奇 1963年版, 第130页。

但它的求援活动并不顺利。首先是在东亚利益较多的英法两国不甚积极。当时欧洲战云密布, 英法无暇顾及东方, 更不愿冒犯日本援助中国。它们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其次, 德意态度冷淡。德国1938年初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 于5月初停止对华的武器供应, 开始走向与日本结盟之路。唯有苏联一直积极慷慨援助中国, 但苏联的援助只能严格地用于抗战事业, 对国民政府的反共活动则是一大限制。1938年10月中国决策者孔祥熙等人为争取美

援曾向美国外交官分析了各国援华情况: 法国慑于日本的淫威, 总是妨碍中国借道印度支那向国内运输从西方购得的军事物资。相比之下, “港英当局在运输问题上很肯帮忙”, 但英国在慕尼黑的绥靖使中国感到“无望从她那里得到援助”。苏联“已明确表示, 除非自身受到攻击, 否则她不会参战。所以中国不指望能够得到比目前苏联提供的装备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苏俄保持一定距离”。只有华盛顿才能改变目前中国的危局。中国当权者的这种想法绝非偶然, 因为美国对中国某种形式的援助在抗战前业已存在。这就是 1936—1938 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白银买卖。中国通过向美国售银不但使自己的通货准备金更加灵活和易于管理, 而且还从中得到一笔 5000 万美元的短期贷款。仅抗战开始的第一年, 中国向美售银价值就达 1.38 亿美元, 其中 4800 万美元用于购买战略物资。在白银购买之前, 还有中美“美麦借款”(1931) 和“棉麦借款”(1934) 这类购货贷款。这些购买和贷款成为 1938 年以后美国援华的契机和先声。同时通过这些财政活动, 中国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以及陈光甫等人, 与美国个别重要官员如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建立了业务和个人的联系。

此外, 中国外交决策者如孔祥熙、宋子文、胡适等的亲美倾向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向美国寻求援助。这批人毕业于美国大学, 与美国政治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对美国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 很自然地把美国视为“我最可靠之友邦”。在他们的影响下, 蒋介石

(美) 布卢姆: 《摩根索传: 危机时期, 1928—1938》(J. Blum, *From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 1928—1938*), 波士顿 1959 年版, 第 60 页。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5 年版, 第 709 页。

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在 1939 年 11 月 11 日给胡适的信中就强调这一点: “国内国共不和, 势难融洽, 对于中苏邦交, 亦虑发生影响。即使彼等继续助战, 其结果亦仅能延长抗战, 并不能奠安大局, 故欲求大局出路仍须另想办法。‘这个出路和办法何在呢? 翁继续写道: “美国始终为我最可靠之友邦……”, 中国抗战要能成功, “国命能得复兴, ……重要关键仍在美国”。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 439—440 页。

在 1938 年 6 月对中外关系作出总结：“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然有所为。”他提出了“运用英美之力，以解中日问题”的战时外交方针。为加强对美工作，9 月蒋介石召回不太为美国所欢迎的王正廷大使，破天荒任命当时在欧美从事民间外交活动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大使。政府给胡适的第一封电报就强调：“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因此，胡适使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美国财政援助。

国民政府求援的最终成功，首先是与其派往美国的外交代表陈光甫、胡适和宋子文（1940 年 6 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赴美）等人的艰苦奔波分不开的。陈光甫作为负责桐油、华锡和钨砂借款谈判的代表，以其“正派”商人的良好信誉赢得了摩根索和美国财政部的信任和友谊。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而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则精通美国政治之道，善于游说和利用华盛顿的各种政治机构。从活动范围来看，三人各有所长，各显其能。陈光甫的工作重点在进行谈判和履行借款合同等具体事务，并为此在纽约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采购国内急需物资。胡适在舆论和知识界向美国朝野人士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影响美国舆论向支持中国抗战方向发展。他曾积极促成了由他的老同学发起的“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

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第 973 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1 页。

美国领导人如此尊敬胡适，以至胡适 1942 年 8 月奉召回国时，他们曾打算向中国表示，希望他留任。罗斯福还欣然在胡适的朋友为胡适编的纪念册上题词：“我非常高兴为我的好朋友胡适博士题词，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比他更出色地代表自由中国的人民，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向我国人民说明中国内在的伟大。”（赫尔致罗斯福，1942 年 8 月 24 日；总统纪事，1942 年 11 月 4 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馆藏，总统公务档，150 中国，第 2 盒。）

会”(America Committee for Non- 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政府援华制日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则活跃于美国政治上层,利用援华机构不统一的特点,抓住各种机会游说各方,施加影响。这一系列活动使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逐步为以后美国国会内外援华集团的形成提供了组织、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

其次,随着日本南下意向的日益明确,重庆传出的中日媾和之风也就日盛,从而给美国决策者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援华压力。中国方面的这些活动,成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从而影响它作出对华有利的决策。

当然,美国援华态度的转变,除了中国方面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其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喊得很响,但它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需要付出代价的行动来维护这一政策。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利益,故而中国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考虑中不占重要位置。即使在远东政策中,美国更注意的是美日关系而非美中关系,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比其与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因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日本蚕食和侵略中国的行动基本上是无动于衷。当时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克莱尔·陈纳德(C. Chennault)写到,美国有关军事当局对中国漠不关心,以致到1940年时连张完备的中国地图都没有。他招募美国人来华作志愿空军的举动,也被认为是“疯子”。

孔华润:《中国结:顾临、拉蒙特、索史思与中国—东亚关系》(W.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 S. Greene, T. W. Lamont, G.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纽约1978年版,第214—229页。

这一时期美中日三国间的经济关系可参阅琼·威尔逊:《美国工商界与外交政策, 1920—1933》(Joan H. Wilson, *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1920_1933*) 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2—229页。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社1978年版,第76、89页。

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 D. Roosevelt)出于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关注,或许还跟他祖父曾在中国做生意赚大钱有关,一直比较注意中日之间的冲突。七七事变前后,他鼓励摩根索更多地购买中国的白银,以支持中国货币。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他对远东均势的关注,不希望中国太弱。罗斯福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最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和特征。当副总统提议从平津地区撤出美军以避免卷入中日冲突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 Hull)等人认为这一行动会被日本人视为美国打算从太平洋地区后撤。罗斯福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是“希望日本遭殃,中国和苏联力量的增长,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起义都会产生这种结果”。

使“日本遭殃”的想法反映了美日关系的紧张。2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把日本作为太平洋上的主要潜在对手。特别是30年代中期,华盛顿和伦敦两个海军军备条约失效后,美日在太平洋上的争夺更加激化。中国和苏联力量的增强无疑会成为制约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中国现存的独立和完整是保持远东均势的重要条件。美国财政部甚至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胜利将鼓励其他法西斯国家侵略冒险,从而极大地增加世界大战的机会。由此,美国东亚政策便出现援华制日的思想。

但寄希望于日本内部变化,幻想日本政府会改弦更张,由温和派代替军国主义,加上美国在日本的广泛经济利益(贸易和投资),又决定美国政府不愿对日本侵华施加任何制裁措施,以免牺牲赚钱的机会,关闭两国和解之门,从而把日本逼上威胁美国利益的南进之路。由此发展出绥靖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倾向。援华制日和绥靖日本这两种倾向遂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内

《摩根索传:危机时期》,第481页。

《摩根索传:危机时期》,第482—482页。美国财政部的推论是这样的:纳粹德国已准备好浑水摸鱼。如果日本征服中国,德国占领捷克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德日还可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而世界和平是与中国能否长期抗战相联系的。

容。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程度的加深,特别是日本南下太平洋威胁欧美殖民利益的战略意图明朗化,美国日益担心东亚脆弱的均势会由于中国抗战的瓦解和英法荷势力的败退而破坏,从而直接把美国推上与日本对抗的第一条战线。这样,援华制日倾向逐步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主流。这一变化从1940年11月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到1941年底日本炸弹落到珍珠港美国人头上才结束。

正是由于援华的目的在于制日,对华政策从属于对日政策,因而就决定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以及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只要美国一天不放弃劝说日本改弦更张不再南进的幻想,美国就一天不会尽力援助中国;只要苏联一天不放弃援华,美国就没有必要全面援助中国。援华的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激烈的报复措施。因而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贷款与同期苏联援助及以后美国的援助相比,数量少,利息高,条件苛。

对此,美国决策者也不讳言。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eson Johnson)在1940年10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美国一再声称的口号是‘尽力援助,但止于战争’。这对苦战三年之久,而认为与我们利益一致的中国人民而言,实在是一很大的打击。特别是这些援助的获得,乃是付出极高的代价。”国务卿赫尔则在与罗斯福多次商量之后,于1940年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在于“一、避免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发生公开的冲突,方能全力援英和加强自身的力量;二、对日本维持我们的原则和权利,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要迁怒日本,致使其军方要求向我们开战。”

当绥靖日本这一制约援华的因素因日本侵略步伐加快而逐步

转引自《中国与外援》,第136页。

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C.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1948年版,第1卷,第911—912页。

消减时,援华的另一个限制因素则在1941年春逐步出现了。这就是形成中的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美国“租借”(Lend-Lease)援华的前提是绝不能够影响全力援英、援苏的需要,这一因素遂成为以后四年里限制美国援助中国的最重要因素。

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财政部长摩根索是援华政策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表现出比国务卿赫尔更为积极的态度。在支持中国抗战维持远东均势这一目标上,财政部与国务院并无分歧。不同的是,前者还时刻考虑为美国日后在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个美妙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国务院则认为,只要中国依靠苏联的援助还能坚持下去,就无需冒恶化美日关系之险援助中国。但罗斯福不论在政治倾向,还是私人关系上,都更倾向于摩根索。因而,摩根索得以毫无阻拦地插手外交事务。

二 全面援助与尖锐冲突:中美抗日 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期(1941.5—1945.2)

1941年以后美国援华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租借”援助。根据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Lend-Lease Act),美国总统有权对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转让、交换、租借或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5月罗斯福宣布中国为受援国。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非正式盟国。据此,中国在1941—1946年一共得到价值16.02亿美元的实物和劳务援助。但这笔援助只占美国全部对外“租借”的3.0%。在所有38个受援国家中,中国所获得的援助额位居英、苏、法三国之后而列第四。这显然与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巨大牺牲

世界和平基金会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World Peace Foundation,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0—1941年卷, 波士顿1942年版, 第711—715页。

极不相称。同时,这笔援助在时间分配上也很不平衡,仅 1945 年一年就达 11.07 亿美元(参见表 2)

在国民政府看来,如果说 5 亿美元贷款是场外交胜利的话,那么 1943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中美平等新约》则可以说是全民族自由解放了,此举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蒋介石为此在《告国民书》中不无夸耀地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完全实现。”新约订立之日因此也成为以后中国的司法节。随后,中国又在 1943 年 10 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与美、苏、英一起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从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这一不那么真实的形象在 1943 年 11 月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但不论是 5 亿美元的取得,还是治外法权的废除,有关决定和谈判的整个过程都表明,在这种华丽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多么脆弱,国民政府的成功也并不那么辉煌。5 亿美元不过是美国为维持中国战场,减少自己牺牲而支付的代价;对国民政府来说,则是利用形势迫使美国人比日本人开出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中国战场。治外法权的废除反映了同样的现实。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行动“并不是(西方)承认中国固有平等权利的结果”,不过是美国等国想利用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鼓励缺乏斗志的国民党士气。这一行动并不象蒋介石所夸耀的那样,完全实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美国等国不得不放弃的只是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望废除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不论是提供财政援助,还是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国都曾煞费苦心试图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灵活性。它想使援助附有条件,并把废除行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

转引自《党史概要》,第 117 页。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原书英文版出版于 1947 年),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2—363 页;

从美国决策过程来看,对华援助政策的主动权开始从财政部转到国务院和陆军部。当财政部从经济角度怀疑 5 亿美元援助的有效性时,后两者则从军事和政治上考虑,强调援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太平洋战争前对援华一向持谨慎态度的赫尔这时却对罗斯福讲:“中国人对侵略者已经作出并正在作出的出色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它。”但欧洲第一战略以及中国对外陆上通路的断绝,决定了美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帐面上的财政和心理支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中美战时同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与和谐,但双方因战略目标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此时已经显露出来了。贷款和废约谈判充满了讨价还价,缺少同盟关系中应有的信任和理解。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 Stilwell)对“租借”物资的控制以及由此引起的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更是反法西斯同盟中所少见。在发动和利用一切力量打败轴心国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旗帜下,中美两国都不认为对方尽力而为了。这种不信任感在随后年代中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见加深,终于在 1944 年酿成危及中美同盟自身存在的危机。

1943 年底的开罗会议代表了中美同盟发展的最高阶段。双方都视之为中美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但随着盟国南北夹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取消,这一成功就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露出来的却是中美同盟外交中不正常的一面:讨价还价,互相猜忌,争吵不休,讹诈威吓以及因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信任危机。这场全面危机的中心议题有两个:财政上的 10 亿美元贷款、美军在华费用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中美货币的汇率问题;军事上缅甸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 1944 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转引自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H. Feis, *China Tangles*),纽约 1965 年版,第 72 页。

在开罗会议, 中国政府以国内经济困难为由要求美国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美国方面不但拒绝, 而且还无情地批评了中国财政政策。这一态度引起中国方面强烈的不满和反弹。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坚持要求美国以 1 : 20 的美元和法币的固定汇率支付美军在华开支, 否则, 中国将不得不退出战争。此举自然有体制上的原因, 汇率的变动会影响法币的信誉, 从而加速物价上涨的势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想报复美国的拒绝行动, 以不合理的汇率, 尽可能多地攫取美元, 补偿没有得到的贷款。由于汇率不合理, 当时美国为一辆自行车就不得不支付 1100 美元, 为一个汽车打火塞支付 75 美元。国民政府的“理财专家”孔祥熙就是用这一方式, 在 1941 年底到 1944 年 1 月间, 按固定汇率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 1.3718 亿美元。他的助手后来回忆说, 孔“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 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支出, 刮到了几亿美元”。不过, 国民政府在获取美元这一问题上也是有限度的, 不管是退出战争的姿态, 还是拒绝为美军垫付法币的威胁, 蒋介石均是以不与美国闹翻分手为限。毕竟, 他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政治上的靠山和经济上的财源。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 美国这次避免了 1942 年 5 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 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 其地位已不象 1942 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 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 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 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 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

寿守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9 页。

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官员斯坦利·亨培克语, 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 年中国卷, 华盛顿 1956 年版, 第 486—488 页。

位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 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更使他不满意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

《摩根索日记(中国)》[Morgenthau Diary (China)], 第2卷, 华盛顿1965年版, 第1040页。

《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中国卷, 第896—897, 902页; 1943年中国卷, 第513—514页。

《摩根索日记(中国)》, 第2卷, 第1116页; 1027—1030页。

《摩根索日记(中国)》, 第2卷, 第1116页; 1027—1030页。

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 1944 年发展到顶点。1943 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 部队)由印度进攻缅北(Northern 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 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促蒋介石,迫使其在 1944 年 4 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 1944 年 7 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 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 10 月决定召回史迪威。

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 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 1944 年 12 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 2.1 亿美元,抵消中国在 1944 年 2—9 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 180 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

转引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72 页。

内经济的急剧恶化。而国民政府管理失策,措施失当,更加深了国内财政危机。孔祥熙敛财的唯一办法就是靠滥发纸币、膨胀通货。孔祥熙曾讲,“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钞票,简单得多”。他的助手后来批评说,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严重破坏了整个大后方,特别是四川的经济。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同时,这一政策也给重庆和华盛顿的朝野人士留下了恶劣印象,并成为孔祥熙后来垮台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些外汇储备后来并没有用于重建中国经济,而是用于祸国殃民破坏和平的内战。

这场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1944年罗斯福向中国派遣特使的最初考虑均源于解决中美财政问题,而这些访问对当时及以后的中美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 Wallace)的访问得出了“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的结论,并促成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的派出。9月份赫尔利和唐纳德·纳尔逊(D. Nelson)使团又产生了另外的结果。纳尔逊的工作直接导致了中战时生产局的建立以及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赴华。赫尔利的活动导致了史迪威的召回并最终把美国对华政策引上了一条没有灵活性的死胡同。

蒋介石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依靠赫尔利的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地赶走了史迪威,他在日记中总结道:“此事为本年内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失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

中美财政危机和有关谈判的详情见任东来:“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孔祥熙其人其事》,第21—24页,30—33页,75—76页,143—148页。
《摩根索日记(中国)》第2卷,第1030页,1080页,1112—1114页。

轮。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蒋的这番感慨印证美国学者邹说的一段评论。邹认为，史迪威事件明显加强了蒋介石的这一信念：“美国有赖于他来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在追求其政策目标上缺乏坚定性，因而美国最终只能听命于他坚持不懈的要求并接受他的观点，而不论他是否有所作为”。

中美同盟到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实际上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赫尔利和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A. W. Wedemeyer)的出现，特别是战争临近结束而产生的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给中美外交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 卷入内争与门户开放：中美 抗日同盟的蜕变(1945. 2—1946. 11)

从 1944 年底开始，随着中印之间史迪威公路(Stikwell Road)的开通和欧洲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对华援助急剧增加。1945 年一年的“租借”援华数额相当于前四年总和的 5 倍(参见表 2)。5 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也是在 1945 年以后动用的。对蒋介石的这些单方面援助加强了其反共倾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意识，使中国国共两党之争更加复杂和尖锐。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从军事上讲是“维持中国战场”(keep China in war)；从政治上讲是“让中国成为一强”(make China a power)。1944 年中期，美国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与日本单独媾和，同时它也放弃了把中国作为反攻日本前进基地的计划，改用从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十三)，台湾中央日报社 1977 年版，第 152 页。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芝加哥 1963 年版，第 122 页。

太平洋直接进攻日本战略。因此,美国的政策从援助中国抗战的单纯军事考虑,转到了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复杂政治谋划。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政府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终于赢得了苏联对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政策的认同。

在罗斯福看来,如果中国由于国共分裂而发生内战,不仅会损害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成果,而且会造成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抗。因此,国共和解中国统一是避免这一灾难后果的前提条件。在罗斯福的这一目标中,中国如果不是统一在蒋介石之下,也必须是在一个亲美的非共党政权之下。对此他坚定不移,从未动摇。因而,他默认了赫尔利对美国在华政策的理解,并赞扬他调处国共分歧的努力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的转移,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使中国有效地进行抗战,华盛顿曾同意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 Gauss)所倡导并实施过的军事上的交换政策和外交上的压力政策(The quid pro quo and the pressure policy)。但这一作法不仅随着史迪威和高思的去职而结束,而且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的转移,而逐步被一种政治上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所取代。尽管从迪克西使团、国务院远东司等处一再传出避免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保持与中共良好关系,以维护美国政策灵活性的呼声,但美国最高决策者实际上默许并支持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华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做法。

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加强了赫尔利对政策制订的发言权。由于史迪威的去职和中国战场重要战略价值的消失,一度对政策有重大影响,并一再坚持有条件援华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乔

美国战时对华军事战略的转变可参阅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这是罗斯福1944年12月20日对内阁成员讲的话,见莫顿·布卢姆编:《远见的代价:华莱士日记》(Morton Blum, ed.,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波士顿1973年版,第410—411页。

治·马歇尔(G. Marshall)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 Stimson)对中国事务已不象过去那么关注。就连那位精力充沛的财政部长摩根索这时也把主要目光转向欧洲事务,失去了往日对中国的兴趣。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善国务院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地位。赫尔利不论是白宫特使,还是驻华大使,都与罗斯福保持直接联系,常常置国务院指示于不顾。他的主张远比国务院远东司的建议更受白宫的器重。赫尔利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堵死了任何可能迫使蒋介石妥协改革,发展美国与中共合作关系的道路。美国对华政策因而失去了一度有过的灵活性,走进了死胡同。

中国国民政府却因此再次掌握住中美外交的主动权。“史迪威事件”后,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内,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态度。通过影响在华的赫尔利、纳尔逊(美国赴华战时生产顾问团团长)和魏德迈等美国人,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在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多方活动和广泛游说,国民政府不仅改善了一度恶化的中美关系,而且加强了美国支持和利用蒋介石,对付苏联(在某些方面还有英国)的政治打算。在这些活动后接踵而来的是美国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全面支持和扶助。所有这些援助和支持已经远远超出了共同抗日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怀疑这些援助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在抗战胜利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与蒋介石密切配合,剥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正当受降权,而且直接出钱出人出运输工具,帮助蒋介石政权独占人民胜利果实,甚至直接派 5.5 万名海军陆

《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1945年7月12日,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115页。在史迪威被召回前夕,周恩来曾公开撰文谈美援:“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增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见周“双十节”讲演,《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

战队替国民政府占领和守卫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名义下,通过继续提供“租借”援助而维系下来的中美同盟,已深深卷入中国的内争,因而在事实上蜕变为反共的美蒋同盟。

这一同盟的存在,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也使美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困境既是1945年以来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结果,也是国际上初露端倪的美苏争夺的产物。面对中国内战危机,不论是美国军方,还是国务院,都明确认识到以美国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为限度的援蒋方针,将无法帮助国民党打败共产党,统一中国。而进一步扩大对国民党的援助,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结果也难以预料。国内舆论的反对,欧洲第一战略的限制,更可怕的是中国与苏联对抗冲突的可能性,都决定了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承担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责任。显然,卷入与不卷入的两种选择一时都不能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一个稳定、统一和对美国友好的中国。

在困境中,美国决策者再次想起国共和平统一的方案,重新开始了一年半前赫尔利失败的调处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压力政策。于是,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成为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特使。与赫尔利调处的前提一样,甚至可以说更为明确,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样的前提决定了同样的失败命运。

马歇尔使华既是为了避免中国内战,更是为了排除美苏在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在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中,苏联取代了过去的日本,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美苏对抗的前景取代了30年代末美日冲突的估计。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对美国“友好”。正像30年代末美国决策者从东亚均势角度考虑对华援助时并没有忘记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一样,马歇尔调处也要促进美

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对这一时期政策有极好的分析和描述。

国在中国一直追求的经济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门户开放的追求最集中地体现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中美商约》从 1943 年开始酝酿到 1946 年 11 月最后签订的整个过程都表明, 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 美国都不曾放弃过对自己在华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追求。通过完整的美援体系, 美国在中国建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明里暗里地影响和干预中国经济政策和国内立法。通过《中美商约》, 美国不仅为自己占领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 而且为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扩张提供了范例。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不无得意地在 1946 年 8 月对他的内阁说:“现在我们总算在中国有发言权了, 总算处在可以把 1898 年政策(门户开放)付诸实施的地位了。”

但甚至这种形式的条约, 也不能满足美国参议院的要求。它希望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 不附任何条件的国民待遇。因而直到《中美商约》订立两年后(1948 年 11 月), 它才有条件地批准了这一条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一条约和先前的美国 1948 年《援华法》一起成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垮台的随葬品, 同时也是美国最终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挽歌。

《中美商约》和 1948 年的《援华法》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史中一个完整阶段的结束。从 1938 年底美国决定对华提供第一笔“桐油贷款”到 1948 年底《中美商约》成为法律, 这 10 年间美国经历了在政治上从卷入中日战争到参与中国内战, 经济上从防止日本独

这问题可参阅任东来:“试论 1946 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4—146 页。

转引自帕特森:“既用于欧洲,何以不适用于中国:1947—1948 年的遏制政策”(T. Paterson, *If Europe, Why not China? the Containment Doctrine 1947-1948*)载《开场白》(Prologue), 1981 年春季号, 第 23 页。

占中国到自己独占中国市场的历史过程。美国最终似乎实现了它对华政策的若干目标:政治上国民党政府不仅是对它“友好”,而且几乎成为它的附庸;经济上,中国门户全面开放,美国的资本商品自由流入。

1938—1948 年这 10 年的中美关系,是以受中国人民欢迎的援华抗日开始,而以中国人民所憎恶的援蒋打内战告终。1938 年美国宣布“桐油贷款”时,美国的援助曾赢得了除一小撮汉奸以外所有中国人的热烈欢迎。1948 年美国通过《援华法》和《中美商约》时,美国的援助几乎遭到除一小撮统治者以外所有中国人的唾弃。历史是这样的有情和无情,它不会忘记美援给中国人民带来过的希望,更会记住它带来的巨大灾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